

商贸驱动型移民的社会融入与教育引导机制研究——以浙江义乌为例

杨觉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由“生存型”转向“商贸型”,浙江义乌作为典型样本,其商贸型移民以经济嵌入为先导的融入路径难以被传统理论完全解释。本研究以义乌为案例,构建“贸易环境—教育干预—融入结果”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教育引导在商贸型移民社会融入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义乌已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多元协同的教育引导体系,政府开展法治与政策规范教育,市场提供商务汉语与职业技能教育,社区推进文化融合与志愿教育,同时保障外籍子女公平教育。该体系通过语言资本、规则知识、社会资本三重转化,推动外籍人员从“经济嵌入”走向“社会嵌入”,在纠纷调解、外籍志愿服务、城市人才融入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当前教育引导仍存在课程供需错配、覆盖不足、文化隔阂、协同不畅等问题。为此,研究提出构建全链条教育服务、开发商贸法治文化融合课程、深化多方联动、建设数字化平台与激励机制等优化路径。义乌模式证明,教育引导是商贸型移民良性融入的关键治理工具,核心在于从“管理控制”转向“服务赋能”,既拓展了相关理论的中国语境适用性,也为外向型城市移民治理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商贸驱动型移民; 社会融入; 教育引导; 分段同化; 文化资本; 协同治理

文章编号 056-2026-3691

Research 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 Guidance Mechanisms of Trade-driven Immigrants - Taking Yiwu,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ue Yang

(Zhejiang Police College,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shifted from "survival-oriented" to "commercial and trade-oriented". 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commercial and trade-oriented immigrants in Yiwu, Zhejiang Province, have an integration path led by economic embedding that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theories. This study takes Yiwu as a case and constructs an "trade environment -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 integration outcom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guidance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ommercial and trade-oriented immigran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Yiwu has formed a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guidance system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community, and family, with the government conducting legal and policy education, the market providing business Chinese and vocational skills

收稿日期: 2025-12-07 录用日期: 2026-02-09

通讯作者: 杨觉; 单位: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杭州

education, the community promot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volunteer education, and ensuring fair education for foreign children. This system promotes foreign personnel from "economic embedding" to "social embedding" through the triple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capital, rule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in dispute mediation, foreig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talents. However, current educational guidance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mismatch in course supply and demand, insufficient coverage, cultural barriers, and poor coordin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building a full-chain educational service system, developing trade law and culture integration courses, deepening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 digital platform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 Yiwu model proves that educational guidance is the key governance tool for the benign integration of commercial and trade-oriented immigrants, and the core lies in shifting from "management control" to "service empowerment",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applicability of relevant theor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migrant populations in outward-oriented cities.

Keywords: Commercial-driven Immi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Educational Guidanc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Cultural Capi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1 绪论

全球化不断重塑国际人口迁移格局，传统以生存就业为主要目的的跨国流动，正逐步转向以商业活动为核心的商贸型移民^[1]。凭借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与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成为这类新型国际移民的重要流入地，而浙江义乌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样本^[2]。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汇聚了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与外资经营主体，外籍人口规模大、来源广、流动性强，城市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3]。当地围绕外籍商贸人才评价、创业服务、跨境纠纷调解等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了以贸易为纽带、以市场为依托的外籍人口集聚生态^[4]。

与欧美传统移民国家不同，义乌的外籍群体以经商创业为主要目的，迁移动机更主动、经济基础更强、社会网络更具跨国属性，其融入过程以经济嵌入为起点，面临的核心挑战是语言沟通、商业规则适应、法律法规认知与跨文化交往^[5]。传统移民融入理论多形成于西方语境，难以完整解释这一以商贸为驱动、以经济为先决条件的融入模式^[6]。

在实践中，语言培训、法治宣讲、文化交流、技能学习等各类教育引导活动，已成为义

乌衔接外籍群体与本地社会的重要纽带。社区、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用柔性方式帮助外商适应规则、融入生活。但目前学界对这一机制仍缺乏系统梳理，教育引导究竟如何作用于商贸型移民的融入过程、通过何种路径产生影响、又面临哪些现实困境，仍有待深入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构^[7]。

本文所关注的商贸驱动型移民，主要指以跨境贸易、物流、电商等商业活动为目的，在义乌长期居留并开展经营活动的外籍人员。其迁移决策高度依赖市场机会，居留状态与商业行为深度绑定，社会融入也呈现出鲜明的工具理性与经济导向^[8]。本文将社会融入理解为一个多维动态过程，涵盖经济整合、文化适应、社会交往与身份认同四个层面^[9]。对外籍商贸群体而言，社会融入不只是稳定经营，更是从“做生意的外来者”逐步转变为认同城市、参与社区、拥有归属感的“城市一员”^[10]。

本研究采用广义视角理解教育引导，既包括面向外籍群体的汉语培训、职业技能学习，也涵盖法律法规教育、商业规则普及、跨文化适应指导等非正式教育形式^[11]。它由政府、社区、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推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帮助外商跨越语言障碍、理解制度环境、

建立社会联结，是商贸型城市实现柔性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关键路径^[12]。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以义乌为案例，与分段同化理论等经典移民理论展开对话，聚焦商贸驱动这一新型迁移场景，探讨教育引导如何影响融入路径、塑造融入结果，有助于拓展国际移民理论的适用边界，推动本土化移民融入理论的发展^[13]。

在实践层面，义乌作为国家级国际贸易改革试点，其涉外治理经验具有重要示范价值^[14]。系统剖析教育引导在商贸型移民融入中的作用

机制，既可为当地优化涉外教育服务、提升治理效能提供参考，也能为国内其他外向型、商贸型城市应对外籍人口治理、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案，对推动跨国群体有序融入、实现多元共生具有现实意义^[15]。

2 分析框架

本研究围绕商贸驱动型移民的社会融入与教育引导机制，整合移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相关理论，以分段同化理论阐释融入路径的多元性，以文化资本理论揭示教育作用的微观机理，以协同治理理论解释多元主体的运行逻辑，三者共同构成本研究的理论支撑^[16]。

在三大理论整合基础上，本研究构建“贸易环境—教育干预—融入结果”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用以揭示商贸驱动型移民融入的完整逻辑与教育引导的核心作用。

2.1 逻辑模型

三大核心变量构成递进与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

贸易环境为前置变量，其中包括义乌的市场开放度、供应链体系、签证与人才政策、商业服务配套及社会包容氛围，构成外籍人员流入与经营的结构条件，是实现经济嵌入的前提^[17]。

表 1. 分析框架的核心维度与测量指标

核心要素	维度	测量指标
贸易环境	市场开放性	供应链完善程度、行业竞争格局、市场国际化程度
	制度便利性	工作许可办理效率、人才认定标准、签证居留政策
	产业配套	物流、金融、翻译、法律等商业服务可及性
	社会氛围	本地居民接纳程度、跨文化交往日常环境
教育干预	制度化教育	政策宣讲、人才培养、职业技能认定
	社区化教育	汉语培训、法律课堂、文化体验活动
	社会化教育	同伴互助、志愿服务、非正式学习
融入结果	经济整合	就业状态、收入水平、经营稳定性
	文化适应	汉语能力、习俗认知与遵从
	社会交往	本地居民交往频率、社会网络规模
	身份认同	居留意愿、归属感、本地人身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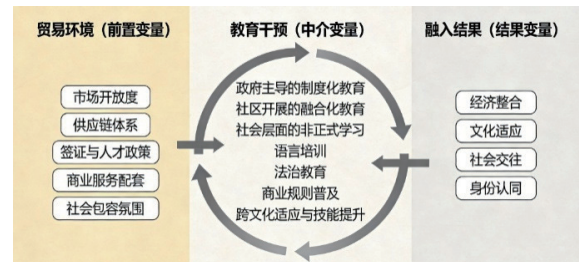


图 1. 本文逻辑模型

教育干预为中介变量，涵盖政府主导的制度化教育、社区开展的融合化教育、社会层面的非正式学习，具体表现为语言培训、法治教育、商业规则普及、跨文化适应与技能提升。

融入结果为结果变量，这体现为经济整合、文化适应、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综合状态，四者相互联动、动态强化，共同构成从经济嵌入到社会嵌入的完整过程^[18]。

贸易环境奠定了商贸移民经济立足的基础，但仅靠市场力量难以自动实现全面社会融入；教育干预作为关键中介，通过文化资本培育与转化，打破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壁垒，推动移民从“在义乌经商”转向“在义乌生活”^[19]；而深度融入又会反向提升其对贸易环境与教育资源的利用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2.2 教育引导的中介作用

教育引导实现了从“经济嵌入”到“社会嵌入”的中介作用，技术路线关系如图2所示。

商贸驱动型移民的独特性在于，先实现经济嵌入，再面临社会嵌入的难题。其早期生活高度围绕商业活动，社会交往局限于交易关系，对社区与城市的归属感较弱，呈现“经济在场、社会缺席”的状态^[20]。教育引导正是弥合这一落差的核心机制，通过三重资本转化推动融入升级。

①语言资本转化。从交易工具转向交往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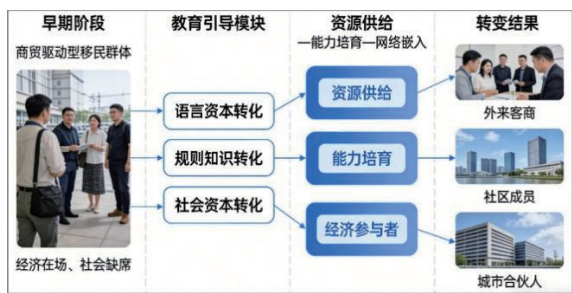


图2 教育引导的中介作用

介。将仅满足议价、订货的商贸用语，拓展至生活沟通、情感交流、公共参与的通用语言，为跨文化交往提供基础能力。

②规则知识转化。从外部遵守转向内化认同。通过法治教育、政策宣讲与规则普及，使外籍人员从被动服从规定，转变为理解规则逻辑、认同制度安排，降低治理摩擦，增强共同体意识。

③社会资本转化。从商业网络转向社区网络。依托课堂、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等非商业场景，构建学缘、邻里、公共参与等多元社会关系，使社会资本从单一功利性转向稳定嵌入性。

教育引导通过“资源供给—能力培育—网络嵌入”的三阶路径，完成文化资本积累与社会关系落地，最终推动外籍群体从“外来客商”转变为“社区成员”，从“经济参与者”转变为“城市合伙人”。这一框架既回应了商贸型移民的场景特殊性，也凸显了教育引导在中国式移民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3 义乌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现状与特征

义乌外籍人员以来自南亚、中东、非洲的贸易商人为主体，居留形态正从短期停留向长期定居演变。从融入表现来看，经济嵌入深度与小商品产业链形成共生关系，社会交往呈现“同胞聚居”与“本地互动”并存的二元结构，文化适应在摩擦中渐进调适，身份认同从“过客”向“新义乌人”缓慢过渡。在此过程中，语言障碍、法律认知不足、子女教育需求矛盾、社区文化冲突构成了融入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内容架构如图3所示。

3.1 义乌外籍人口的结构特征

义乌外籍人口来源高度集中，主要来自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巴基斯坦、也门、阿



图3 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富汗、埃及、印度等国商人构成主体。这一格局与义乌小商品市场定位、性价比优势及发展中国家旺盛需求高度契合，形成了以商贸采购为核心的外籍人口集聚模式^[3]。与北上广等以外资高管、外交人员、留学生为主的城市不同，义乌呈现出典型的商贸驱动型移民结构特征。

义乌外籍人口以商务签证为主要居留形式，同时长期居留与持证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数量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前列。当地率先开展外籍商贸人才评定试点，以贸易实绩、就业贡献、经营年限为评价标准，数千名外籍人员获人才认定，推动外商从短期停留向长期居留转变^[4]。经济稳定与家庭团聚共同成为外籍人员在义乌长期定居的关键动力。

义乌外籍人口职业高度集中于国际贸易产业链，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外贸采购商与贸易

经营者，构成最主要群体；二是国际物流、货代、报关等配套服务从业者；三是提供餐饮、文化社交空间的外籍餐饮经营者。从发展轨迹看，不少外商实现从贸易中间商向生产投资者乃至品牌经营者的升级，体现出商贸驱动型移民的独特成长路径。

3.2 社会融入的多维表现

外籍人员已深度嵌入义乌小商品产业链，覆盖采购、贸易、物流、生产等多个环节，成为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但经济融入仍存在明显壁垒：群体多集中在外贸流通领域，本土零售、高端服务等行业参与度有限；不同国别、族群之间存在隐性行业分割，社会网络与信息壁垒制约了跨领域发展^[5]。

义乌外籍人员社会交往呈现双层结构：一层是以血缘、同乡、国别为纽带的同胞聚居网络，为新来者提供生存与经营支持；另一层是围绕商业、租房形成的本地互动网络，以工具性交往为主，深度邻里交往不足^[20]。近年来，社区通过汉语课堂、文化活动、议事平台等治理创新，逐步拓展非商业交往空间，推动跨文化互动从“生意场”走向“生活圈”。

来自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的外籍群体，在生活习俗、饮食禁忌、行为规范等方面与本地社会存在差异，易引发日常摩擦与邻里矛盾。当地通过完善清真餐饮供给、尊重宗教习俗、推广“以外调外”调解模式，借助外籍志愿者与“国际老娘舅”化解纠纷，在文化差异中搭建沟通与理解渠道，实现多元文化的动态调适^[12]。

早期外籍人员多以经商获利为目标，呈现明显的“过客”心态，归属感较弱。随着居留时间延长、语言能力提升、社会网络拓展，加之人才认定、同城待遇等制度支持，部分外商逐渐形成对义乌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外来客

商向“新义乌人”“城市合伙人”转变，身份认同实现渐进式升级^[10]。

3.3 面临的主要困境

语言不通是外籍人员融入的首要障碍，既导致租房、出行等日常生活不便，也制约商业谈判、合同沟通、信息获取，增加交易成本与纠纷风险。有限的汉语能力只能支撑基础交易，难以支撑深度社会交往与长期发展，成为经济嵌入向社会嵌入转化的关键瓶颈^[11]。

不少外籍人员对我国签证居留、税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等制度了解不足，易出现无意违规，面临居留、经营、信用等多重风险。尽管社区已开展普法教育，但覆盖范围与精准度仍有不足，政策理解偏差与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突出^[14]。

随着长期定居家庭增多，国际流动儿童教育需求快速增长，但教育供给仍存在缺口：课程体系选择有限、语言支持不足、文化适应困难、入学与升学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突出，难以充分满足不同国别、不同家庭的多元化教育需求^[7]。

多元文化共处带来日常习惯、隐私观念、公共空间使用等方面的差异，易引发邻里摩擦；部分商业纠纷外溢至社区生活，进一步加剧矛盾。虽然“以外调外”、文化融合活动等机制有效缓解冲突，但深层文化隔阂与沟通不畅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4 义乌教育引导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

义乌在推进商贸型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形成了由政府、市场、社区、学校共同参与的教育引导体系，通过制度化、市场化、生活化、保障性四类教育活动，系统帮助外籍人员适应制度环境、提升经营能力、参与社区生活、稳定家庭发展，从而实现从经济嵌入到社会嵌入的转变。



图4. 教育引导体系

义乌的教育引导机制，是围绕商贸型移民的实际需求形成的综合性支持体系：政府侧重规则与政策普及，市场侧重经营与语言能力提升，社区侧重文化适应与社会参与，子女教育侧重家庭稳定与长远发展。四类教育相互配合、层层递进，有效降低了外籍人员在义乌生活经营的制度成本、文化成本和社会成本，推动其从单纯的经商者转变为参与社区、认同城市的稳定居留者^[15]。教育引导体系的分析架构如图4所示。

4.1 政府主导的规范性教育

政府在外籍人员教育引导中承担顶层设计、政策供给和规则普及的核心作用，重点解决外籍人员不懂法、不熟悉政策、办事不顺畅的问题。

针对签证居留、税收、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等高频风险点，司法、商务、社区等部门联合开展法律培训与政策宣讲，把涉外法律法规、

办事流程、风险提示送到外籍人员身边。社区在日常服务中嵌入普法内容，通过小型课堂、一对一讲解等方式，降低外籍人员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违规风险^[14]。

在人才政策、贸易便利化、居留许可等改革举措落地过程中，政府通过常态化宣讲和窗口指导，帮助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完成人才认定、签证延期、证件办理等事项，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外籍人员可感知、可获得的实际服务。政务服务与社区代办过程，同时成为政策普及与规则教育的过程，推动外籍人员从被动遵守规则转向主动理解和适应规则。

4.2 市场驱动的功能性教育

义乌外籍人员以经商为主要目的，语言能力和职业技能直接影响经营效率与贸易成本，围绕市场需求形成了实用性极强的功能性教育体系。

商务汉语培训是最主要的内容，教学内容紧密围绕采购、报价、订货、物流、结算等商贸场景展开，同时兼顾出行、就医、社交等生活用语，帮助外籍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实用沟通能力，减少交易摩擦、降低沟通成本^[11]。

随着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逐步跟进，面向外籍人员开展电商运营、国际物流、外贸沟通等技能学习，部分内容与人才评价、职业发展相衔接，支持外籍人员从传统采购商向复合型商贸人才转型。

在市场和社区中，中外商户、居民之间还形成了双向语言互助等非正式学习形式，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方式补充正式教育，进一步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

4.3 社区承载的融合性教育

社区是外籍人员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推动社会融入的关键场域。义乌以社区为依托，通过常态化、生活化的活动，推动外籍人

员从“住在社区”走向“融入社区”。

社区通过邻里活动、文化体验、节日共庆等形式，为中外居民提供非商业性的交往平台，在互动中增进理解、减少隔阂，弱化外籍人员的“过客”心态，增强归属感^[10]。

在此基础上，社区培育了以外籍人员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伍，吸纳外籍人士参与纠纷调解、消防安全、政策宣传、语言互助等工作，并以积分激励等方式稳定参与机制。外籍人员从接受服务的对象，转变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实践中加深对本地社会规则、文化习惯和公共生活的理解，实现自我教育、相互教育^[12]。

4.4 子女教育的保障机制

随着长期居留家庭增多，子女教育成为影响外籍人员稳定居留与深度融入的重要因素。义乌逐步完善国际流动儿童教育保障，以家庭稳定支撑社会融入。

在政策层面，保障外籍子女享有公平的入学机会，简化入学流程，扩大公办及特色学校供给，满足不同家庭的就学需求，缓解长期定居家庭的后顾之忧^[7]。

在学校和社区层面，针对国际流动儿童的语言障碍、文化适应、心理融入等问题，提供针对性辅导与支持，通过配备专兼职服务人员、开展融合活动等方式，帮助儿童尽快适应学习与生活环境，以子女的稳定融入带动整个家庭的长期融入。

5 教育引导机制的成效与局限

义乌围绕商贸型移民构建的教育引导体系，在降低经营风险、促进社区融合、增强居留稳定性等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但同时也存在供给结构、覆盖范围、文化融合、部门协同等方面的短板，整体效能仍有提升空间。教育

主要成效	存在问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降低经营风险： 通过培训提升商户风险应对能力 促进社区融合： 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 增强归属感 促进社区融合： 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 增强归属感 增强居留稳定性： 提供子女教育支持减少流动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供给需求不匹配： 课程内容与商户实际需求脱节 覆盖范围不足： 部分流动群体未纳入服务体系 覆盖范围不足： 部分流动群体未纳入服务体系 文化引导薄弱：缺乏 针对性文化适应课程 部门协同不畅：多部 门资源整合效率低

图 5. 教育引导机制成效分析

引导的主要成效分析如图 5 所示。

5.1 主要成效

教育引导最直接的作用，是帮助外籍商人减少因语言不通、法律不熟带来的经营风险与沟通成本。通过常态化法律宣讲、政策解读和涉外纠纷调解，外籍人员对我国签证、税务、知识产权等制度的认知明显提升，各类无意违规和贸易摩擦显著减少^[14]。依托多语种外籍调解员队伍形成的“以外调外”机制，大幅提高了纠纷化解效率，大量商业矛盾和邻里冲突在基层得到及时处理。同时，覆盖广泛的汉语培训有效改善了外商在采购、谈判、日常办事中的沟通能力，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生活障碍，语言能力的提升直接转化为经营便利与经营效益^[11]。

在鸡鸣山等外籍人口集中社区，教育引导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有效改善了多元文化共处环境。社区通过文化活动、邻里交流等平台，为中外居民提供了非功利性交往空间，减少了因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引发的误解与矛盾。依托外籍志愿者建立的调解队伍，在处理涉外

纠纷时更易获得信任，矛盾化解率高、对抗性弱。志愿积分等激励机制，推动大量外籍人员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在消防巡查、语言互助、政策宣传等工作中发挥作用，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良性循环^[12]。

教育引导与人才政策、家庭服务相结合，推动部分外商从“短期经商”向“长期定居”转变。义乌将外籍商贸人员纳入人才评价体系，给予相应服务与待遇，强化了外商对城市的制度认同与归属感。随着居留时间延长、语言能力提升、社会关系拓展，部分外商逐渐形成“新义乌人”的身份认知。针对国际流动儿童的教育保障与关爱服务，解决了长期定居家庭的后顾之忧，以子女稳定带动家庭稳定，进一步强化了外籍群体在义乌长期发展的意愿^[7]。

5.2 存在的局限与问题

现有教育供给与商贸型移民的实际需求不完全匹配。一是通用汉语培训多，面向贸易谈判、合同解读、市场运营的商务汉语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经营进阶需求；二是以短期课堂、零散讲座为主，系统化、进阶式教育课程偏少，学习连续性不强；三是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有限，针对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定制化培训仍显不足^[11]。

当前教育引导主要集中在居住稳定、条件较好的常住外商，集中在少数示范社区，对流动性强、无固定居所、经济条件较弱的外籍务工人员覆盖明显不足。这一群体语言基础弱、法律知识匮乏、权益风险最高，却最难以进入现有服务体系，客观上形成治理盲区，也使得部分风险行为难以从源头预防。

现有教育引导以语言、法律、技能等实用性内容为主，更多解决“能用、会用”的问题，在文化沟通与价值认同层面仍较薄弱。文化活动多停留在节日体验、习俗展示等表层互动，

对契约意识、公共规则、权责观念、邻里伦理等深层内容缺乏系统性引导，文化隔阂与观念差异仍可能引发隐性矛盾，制约身份认同的真正形成^[6]。

教育引导涉及教育、公安、商务、社区等多个主体，但部门间信息共享、政策衔接、工作联动仍不够顺畅。涉外人员信息分散在不同部门，难以形成精准画像与精准服务；人才政策、签证管理、子女教育、社区服务之间缺乏一体化联动；前端教育预防与后端管理执法衔接不够，整体治理仍处于分散推进状态，制度化、常态化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15]。

6 优化商贸型移民教育引导的路径建议

结合义乌商贸型移民社会融入现状与教育引导存在的问题，本章从顶层设计、课程内容、多元主体、数字赋能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教育引导体系的具体路径，为义乌及同类外向型商

贸城市优化涉外治理、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提供参考，推动义乌教育引导从零散供给走向系统服务、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融合、从经验运行走向数字赋能，为商贸型移民社会融入提供更可持续的制度支撑。移民教育引导的路径分析如图6所示。

6.1 顶层设计：构建全周期教育服务体系

当前教育引导碎片化、不均衡、协同不足的问题，本质上是缺乏整体规划。要从城市国际化战略出发，建立覆盖外籍人员入境—居留—发展全过程的教育服务体系。

将移民教育纳入城市国际化发展整体布局，明确教育引导在涉外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语言、法治、文化适应等内容作为公共服务投入，稳定经费保障，推动教育服务与人才认定、居留便利、公共服务等政策相互衔接^[14]。

围绕外籍人员不同阶段需求，建立分阶段教育服务清单：

入境阶段以基础适应为主，在办理签证、居留等环节提供基础法规、市场与生活常识介绍，帮助初到人员快速建立规则认知；

居留阶段以能力提升为主，分层开展生活汉语、商务汉语、法律常识等培训，扩大社区教学点覆盖，形成稳定供给；

发展阶段以职业赋能为主，面向稳定经营、长期居留人员提供跨境电商、物流管理、品牌运营等技能培训，支持其向更高层次转型。

6.2 内容重构：强化“商贸+法治+文化”融合课程

针对课程实用性不足、文化融合浅表化等问题，重构教育内容，突出针对性与双向融合。

开发贴合义乌市场的商贸汉语与法律合规课程，将询价、订货、合同、报关、知识产权、税务等实务内容纳入教材，形成从基础到进阶的体系化课程，满足外商经营与合规需求，减



图6 移民教育引导的路径

少因语言与规则不熟引发的纠纷^[11]。

推进双向文化教育：一方面继续面向外籍人员开展中华文化与社区规范教育，增进对本地规则与价值理念的理解；另一方面面向本地居民、商户、学生开展跨文化理解教育，提升包容度与沟通能力，减少文化误解。同时支持长期居留、认同度高的外籍人士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多元文化良性互动^[12]。

6.3 主体多元：深化“政—校—社—企”协同

教育引导不能仅依靠政府与社区，需要构建多方参与、分工协作的治理结构。

鼓励本地高校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将专业师资、课程体系引入社区与市场，面向外籍人员提供汉语、商贸、电商等系统化培训，推动高校资源与涉外需求精准对接。

支持涉外社会组织与外籍志愿者队伍专业化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稳定纠纷调解、儿童关爱、跨文化辅导等专业服务，推动外籍志愿者向具备专业能力的社区工作者转型，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12]。

发挥外国商会、行业协会作用，开展行业自律与内部教育，协助开展政策宣传、信息沟通、纠纷协调，形成“以外带外、以商带商”的教育引导模式。

6.4 技术赋能：打造数字化教育管理平台

运用数字化手段破解资源分散、信息不对称、覆盖有限等问题，提升服务精准度与便捷度。

建设多语种线上服务平台，整合政策通知、办事指南、在线课程、活动报名等功能，提供碎片化、可及性强的学习资源，实现政策精准推送、线上学习、服务预约一体化，让流动性强的群体也能便捷获取服务^[15]。

建立学习积分与激励挂钩机制，将参与汉语学习、法治培训、志愿服务等情况纳入积分

档案，与居留便利、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公共服务优惠等正向激励挂钩，以柔性方式引导外籍人员主动参与教育与社区治理。

7 结语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义乌商贸型移民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外籍人员社会融入的现状、教育引导机制的运行逻辑、实际成效与存在问题，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教育引导是推动商贸型移民实现高质量社会融入的关键治理工具。义乌的实践表明，在以市场为纽带、以外商为主体的移民结构下，通过政府、市场、社区协同开展的政策法规教育、商务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活动，能够有效降低外籍人员在华经营与生活的制度成本、沟通成本和文化成本，帮助其在经济嵌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文化适应、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9]。教育引导不只是技能与知识的传授，更是社会资本培育、归属感塑造和多元共治整合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移民融入路径的选择与走向，印证了移民融入具有多元可塑性，而教育是其中重要的干预变量^[16]。

第二，商贸型移民治理必须从“管理控制”转向“服务赋能”。传统涉外治理多以风险防控为核心，而义乌的经验表明，更可持续的路径是以服务促融入、以赋能强认同。将外籍人员纳入城市人才体系，提供稳定可及的语言、法律、生活服务，鼓励其参与社区治理与志愿服务，本质上是把“外来客商”视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与建设者。当外籍人员在制度上被认可、在服务中被尊重、在参与中被需要，就会逐步弱化“过客”心态，增强长期居留意愿和城市归属感，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10]。

7.2 展望

义乌的探索对我国对外开放前沿城市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随着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城市将面临外籍人口管理与服务问题。义乌形成的包容共治理念、“以外调外、以外融外”的实践机制、“适应—融入—参与”的教育引导路径,可为广州、青岛、昆明等外向型城市提供借鉴,但在具体推广中仍需结合本地人口结构、产业特点和文化环境进行本土化调整^[15]。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移民二代与代际融入问题。随着长期定居家庭增多,义乌国际流动儿童规模持续扩大,这一群体的教育机会、文化适应、身份认同和未来发展,将成为社会融入的核心议题^[7]。社区设立国际儿童主任、开展儿童融合活动等实践,为研究移民二代成长提供了现实基础。后续可从教育、心理、社会互动等视角,深入探讨国际流动儿童的融入机制,为完善相关服务与政策提供学理支持。

义乌从“鸡毛换糖”的小城发展成为全球商贾汇聚的开放城市,其最可贵的启示在于:教育引导不仅是一项社会治理工具,更是城市包容度与文明程度的体现。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获得发展机会、感受到尊重与归属,既能实现个体融入,也在微观层面践行着开放合作、多元共生的价值,这也是义乌经验对全球化时代城市治理的长久意义^[1]。

参考文献

- [1] Castles S, De Haas H, Miller M J.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M]. 5th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2] 李志刚. 中国城市外籍人口空间分布与形成机制——以义乌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5): 1123-1136.
- [3] 义乌市人民政府. 义乌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23)[R]. 义乌: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 [4] 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浙江省外国人永久居留与人才签证试点工作总结报告[R]. 杭州: 浙江省公安厅, 2022.
- [5] 田孟, 张秀梅. 商贸驱动型移民的社会网络与经济嵌入研究——基于义乌的田野调查[J]. 人口研究, 2021, 45(3): 88-102.
- [6] Portes A, Zhou M.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 530(1): 74-96.
- [7] 王辉, 陈思. 国际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困境与对策研究——以义乌为例[J]. 教育科学研究, 2022(8): 55-61.
- [8] Liang Z.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Yiwu[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20, 54(2): 450-475.
- [9]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0] 麻国庆. 家庭、社区与社会结构: 中国移民融入的微观机制[J]. 社会学研究, 2018(4): 1-25.
- [11] 张秀梅. 语言资本与外籍商人的社会融入——义乌“国际社区”的实证分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6): 112-120.
- [12] 刘祖华等. 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外籍人口社区融入路径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 18(2): 105-116.
- [13] 周敏. 美国华人社会的新变化与 segmented assimilation 理论的适用性[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9(1): 1-10.
- [14] 国家移民管理局. 中国移民管理发展报告(2023)[R]. 北京: 国家移民管理局, 2023.
- [15] 国务院. 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Z]. 2019-05-18.
- [16]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A]//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258.

- [17] 郑杭生 .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8] 杨菊华 . 国际移民融入理论与中国实践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17, 34(3): 98-110.
- [19]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0.
- [20] 马戎 . 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